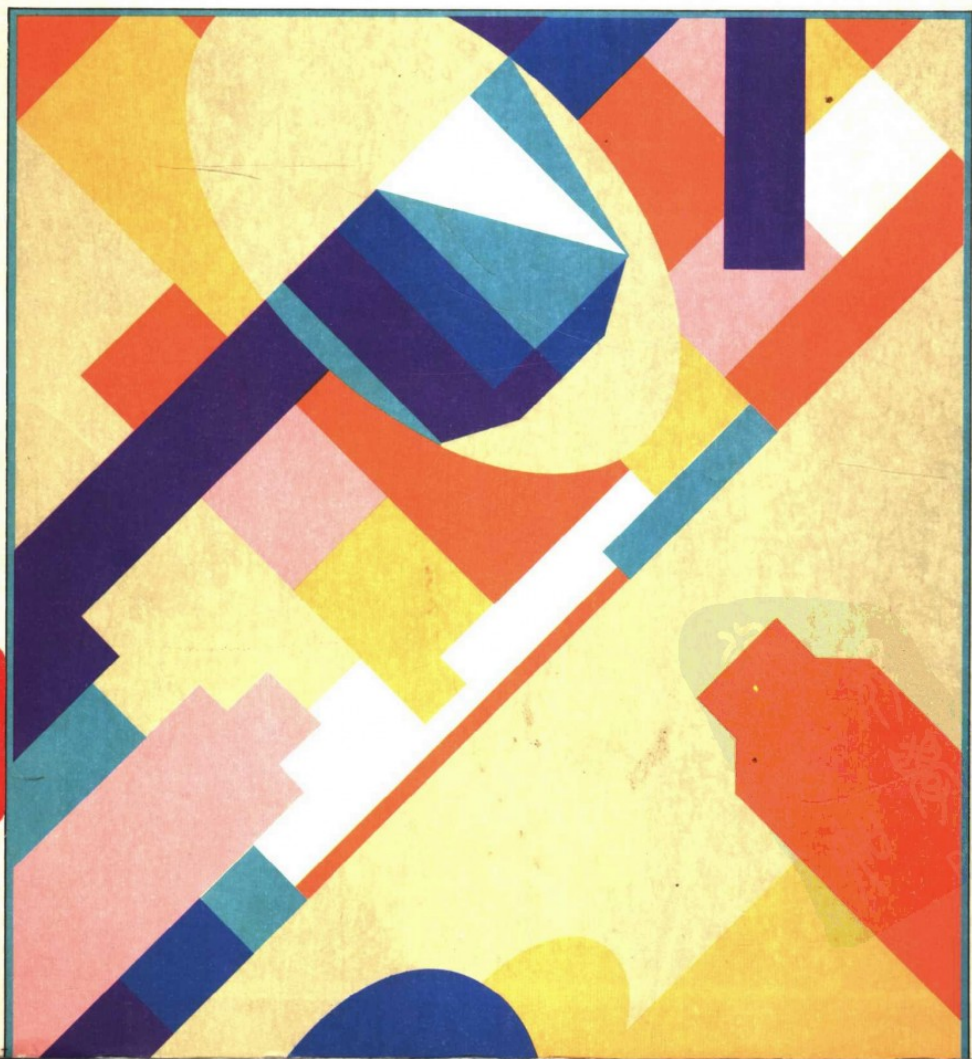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名著譯叢 36

告別式

Simone de Beauvoir 著 賴建誠譯



現代名著譯叢 ③⑥

告別式

Simone de Beauvoir 著

賴建誠譯

獻 給

曾經喜歡
現在喜歡
將會喜歡
沙特的人士

譯 序

一、介紹這本書

1980年4月中旬沙特病逝於巴黎，當時有非常熱烈的報導、紀念等等活動，送葬的行列估計有五萬人以上。據報上說，這是自法國文豪雨果（Victor Hugo, 1802-1885）之後，法國民眾對一位作家最隆重的告別式。

一般對沙特的認識，大都集中在他出版《噁心》（*La nausée*, 1938）、《存在與虛無》（*L'être et le néant*, 1943）、《自傳》（*Les mots*, 1963）這幾個階段，以及在1968年5月運動前後他積極介入政治活動的事蹟；當然，更重要的是1950-60年代的存在主義運動。可是，晚年的沙特是個怎樣的人？他的生活、思想、健康狀態，在最後的十年當中有過哪些變化？暮年的沙特已經衰老半盲，自己很少提筆為文，可是，引人好奇的是，他的內心狀態是怎樣的情形呢？這些在思想史上當然是次要的事，然而，這片好奇心存在許多人心中。當然，大家也都知道有一個人最有資格來為世人解謎。

1981年，沙特的主要伴侶西蒙·德·波娃（*Simone de Beauvoir*）在加利瑪（*Gallimard*）出版社出了一部書，名為《告別式》（*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*）。這本書分成兩部分，前半部是波娃從她1970年到1980年的日記中，抽出與沙特相關的部分，改寫成此書的上半部「告別式」。為什麼取這個名稱？據法文本書背的介紹是這樣：有一年初夏，他們兩人要分別一個月，沙特對波娃說：「所以，這是告別的儀式？」波娃就預覺到，有一天總要用到這句話的。而這場儀式持續了十年，這也就是那本書前半部的內容。

下半部是1974年夏在羅馬渡假時，波娃帶著錄音機向沙特發問，之後，同年秋季在巴黎完成的對話錄。詳細內容在對話錄開始時的序言中有詳細的交代。現在譯出來的是上半部，下半部希望在兩年內也可以譯印出版。

原書的平裝本於1987年4月收入Folio文庫第1805號。英譯本由紐約的Pantheon Books公司於1984年出版，譯者是Patrick O'Brian，英國版則由企鵝文庫（*Penguin Books*）出平裝本（1985）。英文本有索引（但不完整），而法文本沒有，所以查索時以英譯本較方便。我的中譯是以法文本為主，並和英譯本參照對讀之後譯的，希望能減少誤譯與愚譯。基本上這不是理論、論證式的書，誤解的可能性較低，翻譯時的困難比較小，也較沒有「翻譯就是背叛」的罪惡感。由於譯者的層次和文字的駕御能力都比不上原著，所以中譯本和英譯本一樣，必然都會有走樣的情形。原文有少數的註解，在中譯本內以〔13〕表示；另外我加了一些譯註，以⑬表示。

原書上半部的「告別式」若單獨出版，略顯薄弱，而全書同時出版又有兩個困難：一是下半部尚未譯完，二是整本書太厚，可能會超過六百頁。所以我從其他來源譯了四篇訪問沙特的對話來當作附錄，各篇的出處在篇頭都有詳細的說明。其中前三篇收錄在沙特的最後一冊文集《情境》（*Situations*）第十冊（也是最後一冊，1976年）的下半部（第91-226頁）。這三篇對話錄應該可算是了解晚年沙特的要文獻。第四篇附錄是沙特談他和女性之間的關係，相當的有「內幕性」。第五篇附錄是我在1985年底寫好，1986年初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報導性文章，是紀念品性質。

有兩本沙特的傳記可以幫助我們對他的生活、寫作、哲學思想、戰後法國的思想界與政治的局勢作進一步的了解，作者所引用的文獻也相當完備，在此推介。

1. Annie Cohen-Solal (1985) : *Sartre*, Paris: Gallimard (英譯本 New York: Pantheon Book)。本書的出版過程請見我在附錄五中的介紹。這本書資料豐富，珍貴的圖片不少，但我覺得文體平淡，表達的方式太過於平面式的描述。

2. Ronald Hayman (1986) : *Writing against: a biography of Sartre*, London: Weidenfield and Nicolson。作者從許多一手與二手文獻中整理出沙特傳記，是一本平實的描寫，相當清楚明白。

中文書籍中譯介沙特和波娃的出版物相當不少，對他們兩人的生平與著作也都有相當詳盡的介紹，這些基本上在台北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裡都可以找到，我就不詳說了。

二、譯後記

以下是我在翻譯這本書期間的想法，純粹是紀念的性質。我為什麼要譯這本書，一本非學術性的日記體和對話形式的書？我平常從台灣知識圈的譯介裡獲得了不少的知識，在這個讀書圈內，我認為大家都有相互提供糧食的責任。人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需求與供給，我的專業是經濟學，所以在越域供給時，不應該譯介非本行的經典，恐有大誤，只敢提供一分點心來和大家分享，同時也請各位「讀書子」把譯介當成一項利人利己的公益工作。

我目前的年齡階段，是應該在專業研究上積極專注的時候，而竟然把寶貴的時間用在翻譯這種非專業、非經典的書上，實在是不合道理，但這和我翻譯這本書期間的生活方式有點關係。我平日在新竹工作，周末回台北「探親」，一方面需要轉換心情，另一方面又不願把周末的時間耗掉，所以這本書就是兩年（1987年6月中旬到1989年6月上旬）的周末與假日期間，斷斷續續時快時慢累積成的。同時我也感覺到翻譯的另一項功能：它是一種很好的鎮靜劑，可以平衡一下專業工作上的單調、緊張與挫折。所以，對我而言，翻譯是一種「靜坐」。我用了兩年的「剩餘」時間做了這件事，就算沒有苦勞也有疲勞，看到一個階段的完成，有一種欣慰的感覺。

翻譯這本書的兩年期間，也正好是我的兒子從孕育到牙牙學語的過程，或許廿年之後他將會明瞭他在這本譯書中的角色。

《戰國策》內有〈觸讐說趙太后〉一文，其中有一段是太后曰：「丈夫亦憐少子乎？」對曰：「甚於婦人。」太后笑曰：「婦人異甚。」高中國文課本上曾讀此文，廿年後終於體驗到了其中的意義。

1989年6月1日 新竹 清華

前 言

我所寫過的書中，這是第一本（也是唯一的一本）在出版之前您尚未先讀過的。這一本書完全寫有關您的事，而您卻置身事外。當我們還年輕時，在一場激烈的爭論之後，其中有一位在大勝之餘，向另一位說：「您已經在你那小盒子裡了！」^①您現在是在您那個小盒子裡了^②，您不能出來，而我也不能在那裡和您相會：即使他們把我葬在您身邊，把您的骨灰放在我的遺骸旁，那也不會有任何改變。

我在此所說的「您」，是虛構的，是為了文詞上的方便。沒有人聽得到，我也不是在對任何人說話。但實際上，我是在向沙特的朋友述說：那些想更了解他晚年情況的朋友們。我所要敘述的事，也是我曾經生活過的。我也談到一些我自己的事，因為證人也是證詞的一部分，但我盡可能的減少我自己的部分。

①意指對方已完蛋、死了，玩笑語。

②本書寫於1980年沙特逝後，在此是說沙特已在「小盒子」（棺材）裡了。

因為這不是以我為主題的書，而且，有朋友問我怎麼去了解這些事時，我的回答是：「這不能用言語說得明白，寫不清楚，也無法思考；只能去體驗，如此而已」。

這些文章基本上是根據我那十年之間的日記，同時也根據我蒐集到的許多說詞所寫成的。感謝各位曾以書面或以口頭方式，協助我重估沙特晚年活動的人士。

目 次

譯 序	i
前 言	vii
一九七〇	1
一九七一	19
一九七二	37
一九七三	63
一九七四	103
一九七五	123
一九七六	147
一九七七	155
一九七八	171
一九七九	179
一九八〇	187
附 錄	
七十自述	203

x • 告別式

波娃訪沙特談女性主義.....	303
沙特談《福樓拜傳》.....	321
沙特的愛情經驗.....	349
新沙特熱潮.....	371
索引.....	379

一九七〇

沙特畢生都在塑構問題，一直都注重他所謂的「意識型態的興趣」（*intérêts idéologiques*）。他不想脫離這種思考，所以常常去「反對自己的思想」，費力去「打碎頭腦裡的骨頭」。1968年5月的事件^①，他曾積極參與，而且受到深刻的震動，對他而言，這是一項重新調整的機會。從知識分子的立場而言，他有被質疑的感受。在那事件後的兩年期間，他置身在那些問題裡，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的角色，修正他自己過去的觀念。

他常常對這點作解釋。有一陣子^②，他認為知識分子是一種「實用知識的技術員」。知識分子在知識的全盤性，和（製造知識分子的）統治階級的特殊性之間，被兩者之間所引起的矛盾撕裂。因此，知識分子就會有黑格爾所說的「不幸的意識」。

①這是巴黎第十大學的學生抗議教育體制所引發的全面性改革運動，波及世界各地。因內容複雜，請見台北發行的《當代》月刊第三期（1986年7月號）「反叛的六〇年代」專輯（下），有較詳細的解說。

[1] 尤其是他在日本所發表的講演（譯案：1966年沙特曾到日本訪問，不知作者是否指此時期）。

為了要彌補這種邪惡的意識，知識分子就認為應該要把自己置身於無產階級這一邊。目前，沙特認為他應該超越這個階段：對「古典的知識分子」，他提出「新知識階級」的觀念，為知識分子尋找一個新的「民眾」地位，新知識階級要和群眾融合在一起，以達到真正的全盤性。

在還沒有完全清晰之前，沙特已經在嘗試循著這條路線行事了。1968年秋季，他接辦了一份刊物，叫做《互鬥》（*Interlutes*），這份刊物在政治活動人士之間流傳，有時是油印的，有時是印刷的。他和蓋世馬（Geismar）見了幾次面，之後就積極的想去做蓋世馬在1969年初告訴他的想法：編一份報紙，讓群眾來和群眾對話，或甚至讓已參與部分爭鬥的民眾來向群眾說話，導引他們進入這項過程。做了不久，這項計畫就夭折了。後來蓋世馬加入了「左派無產階級」（*Gauche prolétarienne, G. P.*）^②，和毛派（中共）的人共同創辦了《人民戰報》（*La Cause du peuple*）。這份報紙沒有老闆。它直接或間接由工人寫稿件，由行動分子在街頭發售。它的目標是要法國從1970年起，發動一項由工人引導的爭鬥。它常表現出反對知識分子的態度，在羅蘭·卡斯托（Roland Castro）的審判事件時，反對沙特本人^{〔2〕}。

②法國極左派的政治團體，受到毛派（中共）路線的影響。1968年學生運動時成立，1970年5月27日被法國政府解散。它的影響範圍只在幾個大學之內，原先想打人工廠的計畫完全失敗，但它的機關報《人民戰報》（*la Cause du peuple*）的影響力則較大。

〔2〕卡斯托（Roland Castro）是「革命萬歲」（*Vive la Révolution*,

但是，透過蓋世馬，沙特認識了幾位「左派無產階級」的人。《人民戰報》的某些文章，攻擊執政當局過了火，它的第

V.L.R.)組織的激進分子，曾經和克拉威爾(Clavel)、雷立士(Leiris)③、惹內(Genet)④及其他人，佔領「法國工商業主全國協會」(C.N.P.F.: Conseil national du patronat français)⑤辦公室，抗議五位外國工人因暖氣瓦斯窒息而死。「國家安全隊」(C.R.S.: 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)以暴力逮捕他們，後來都釋放了，只有卡斯托一人在十字路口紅燈時企圖跳車逃脫。被警方逮捕後，他被控對警察人員施暴，判了徒刑。因為法官不願在政治的層次上考慮此案件，但這是一件確屬政治性的案件，所以沙特為他做證。而《人民戰報》對這項證詞做了惡評。

③Michel Leiris，1901年生於巴黎，法國作家與人類學家。早期曾參與「超寫實主義」運動，後來雖與該運動主要人物決裂，但仍為「超寫實主義運動」的主要論者。此外也參與許多知識界的活動，戰後加入沙特辦的《現代》，與沙特站在同一陣線。除了文化工作外，也去過非洲、中國(1955)、古巴(1967-68)。在諸多著作中，以《遊戲規則》(*la Règle du jeu*)四冊(1948、55、66、76)為代表作。

④Jean Genet，1910年12月19日～1986年4月15日，法國作家、劇作家。私生子，父不明，自小被母親遺棄，在育幼院長大，16歲被送到「教正院」，曾當過乞丐、男妓、竊賊。但他的作品受到(沙特)相當高的評價，有一次因犯案被捕，法國作家向總統力保開釋。國內劉光能教授是研究惹內的專家。

⑤法國各行業的民間組織，1968年大罷工之後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，地位日形重要。1981年5月社會黨執政後，一直反對政府對企業所課徵的稅賦與社會福利金。

一任負責人勒當迭克（Le Dantec）和第二任的勒普利（Le Bris）都被逮捕，蓋世馬和其他的行動分子提議由沙特接任。他毫不猶豫的接受了，因為他認為他自己名字的分量對毛派人士有用。「我有點嘲諷式的，把我的聲譽放在天平裡」，這是沙特後來在比京布魯塞爾的一項演講中所說的。從那時起，毛派人士對他們自己的判斷，以及對知識分子的策略有了修正。

我在《總結》（*Tout compte fait*, 1972）^⑥書中，提過勒當迭克和勒普利案件的審判，那天是5月27日，沙特被指定當證人。那天，政府解散了「左派無產階級」。在那件事不久之前，在塞納河左岸邊的互助小廣場（Mutualité）有一項聚會，蓋世馬召集群眾走向街道（5月27日），以抗議那項審判：他只講了八分鐘就被捕了。

沙特主編的《人民戰報》第一期是1970年5月1日出版，政府對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，但是內政部卻在每期出刊時，在印刷廠就採取行動。幸好印刷廠的人搶先運走大部分，所以政府就到報販身上去搜，把他們帶到法庭接受特別審訊。我也說過，沙特、我，以及許多朋友，都曾在巴黎市中心賣過那份報紙，但沒有受到嚴重的干擾。有一天，當局對這項戰鬥厭倦了，《人民戰報》就可以在書報攤上銷售了。我們創辦了一個協會叫做「人民戰報之友」，雷立士和我擔任負責人。政府原先不發給我們協會成立的登記證，我們是在向行政法庭申述後才取得的。

1970年6月，沙特出力設立「紅色救援會」（*Secours rouge*）

⑥1972年出版，是波娃的第四部自傳。

⑦，他和替翁（Tillon）^⑧是該會主要人物，目的是在對抗壓迫。該會的籌辦委員擬了一項全國宣言，其實大部分是沙特所寫的。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如下：

「紅色救援會」是一個民主、合法、獨立的協會。它的基本目標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護衛受到迫害的人，給予他們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支持，並擴及他們的家人，任何人都可以請求援助……

……如果不能把民眾的團結心結合起來，就不可能護衛正義與自由。「紅色救援會」是民眾的組織，是在戰鬥中為民眾服務的。

這個組織包括了主要的左派團體，有「基督證言」派（*Témoignage chrétien*）和各路人馬。政治綱領也很廣泛。它的基本動機，是在反對「左派無產階級」解散之後，由馬色藍

⑦這和「國際紅色救援會」（*Secours rouge international, S. R. I.*）不同。*S. R. I.*是1922年由第四共產國際所創辦的，目的在「對被資本主義俘捕入獄的人士，予以物質和精神上的援助」。1923年該會在法國各地成立分會；1938年獨立，並改換過幾個名字。「法國紅色救援會」是1925-26年成立，之後於1938年改名為「法國人民救援會」（*Secours rouges français*）。沙特的這個組織，大概是倣此而設，內容與經過不詳。

⑧Charles Tillon，1897年生於法國中西部的Rennes城，法國的政治人物。原是鋼鐵工人出身，曾參與、領導多次罷工，多次加入、被開除於法共黨，有幾本談社會革命的著作。